

## 增订版说明

读者看到这个版本可能会提出一个问题：去年7月该书刚出版，为什么不到一年就出增订版？我来说明一下。

《最后的“天朝”》一书在2009年开始写作，2015年完成初稿，经过不断的修改，于2016年5月定稿。差不多与此同时，日文和韩文的翻译稿也已成形。我的想法是先在大陆出版中文，然后再出版外文。不料，中文稿在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送审时，拖了很久，迟迟没有结果。日本岩波书店催得急，便在2016年9月首先出版了日文版。大概到年底时，中文版送审的结果出来了：目前不宜在中国大陆公开出版。于是，2017年4月韩文版便出版了，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的中文版也准备付梓。

那时，“萨德事件”闹得正凶。我在大连的一次学术报告中，讲述了本书的基本观点和结论，其中一点就是：中朝之间同盟关系的基础早在“文革”结束时就已经发生动摇，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朝鲜已经不是中国的盟友，而是潜在的敌人。结果，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个演讲稿在网上公开后，引起强烈反响，针对我关于中朝关系的说法，有人支持，更有人反对，甚至还有人指责我是“叛徒”、“汉奸”。对于那些毫无学术理念的无端攻击，我并不在意，但这里的确有一个学术性问题需要回答。

从历史发展过程看，中朝同盟的瓦解发生在1980年代，我在写作本书时虽然也看到一些史料，但感觉不够充分，似乎还要等一段时间才可以从历史学的角度进行研究。所以，对中朝同盟的瓦解，只是作为“尾声”做了简单的论述。对此，我在“后记”里已有说明，并表示将来有足够的史料时再补写一章。现在看来，既然“中朝同盟关系已经瓦解”这个结论如此“意外”和“惊人”，就必须对读者有

一个交代，不能三言两语讲一下结论，而应该对这个历史过程有较为详细的描述。这是一个学者应负的责任，我决定立即开始研究邓小平时代的中朝关系。

作为历史研究，必须从档案入手。然而，在我写毛泽东时代中朝关系所使用的档案文献中，可以利用的史料不多——中国档案尚未解密，俄国档案涉及的内容有限。好在我们华东师范大学周边国家研究院正在承担一项国家特别委托项目——中国周边国家对华关系档案收集和整理，我发现，韩国和日本的外交档案都已经解密到1986年，甚至更靠后。有了这些原始文件做基础，再有中国外交部、中联部1980年代印发的大量内部刊物，并补充以当时各国的公开报刊，这项研究还是可以进行的。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我完成了“改革开放与中朝同盟基础的瓦解”一章的写作。虽然仍有很多历史细节还不清楚，很多历史链条尚未衔接，但大体脉络还是描绘出来了。

考虑到本书的主体是毛泽东时代的中朝关系，新补的这一章还是作为“尾声”比较适宜，也解决了我在后记中所说“头重脚轻”的问题。在这个写作过程中，我依据新的史料和一些学者的意见，也对初版稿进行了不少细节的修订。在此，我对为本书提出问题和意见的各位同仁，以及为我提供日本档案中译文的徐显芬教授和帮助我翻译韩国档案的赵青峰同学，表示感谢。

顺便说一句，今年9月将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本书英文版，就是在这个中文增订版的基础上翻译的。

沈志华

2018年3月15日

## 导言

# 还原一段历史真相

一个神话，一个关于中朝关系的历史神话，几十年来一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广泛流传。

自新中国建立直到今天，在绝大多数的时间里，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朝鲜劳动党机关报《劳动新闻》及两国其他公开报刊长篇累牍地重复着同样的话语：中朝两国唇齿相依、手足情长、休戚与共，中朝之间的友谊是用鲜血凝成的，是经历过战火考验的，中朝人民的传统友谊将世代代流传下去……笔者生活在中国大陆，是共和国的同龄人，与所有中国老百姓一样，关于中朝两国关系的表述，一生所见所闻，都是上面这些赞美的言辞，甚至在双方高层关系极其紧张的时期，亦是如此。中国有句成语，叫“三人成虎”。一个故事，一句传言，无论真假与否，连续不断地对你讲了60年，就成了神话，由不得你不信。

其实，直到几年前，对于几乎所有中国人来说，朝鲜还是一个极为神秘的国家。这首先表现在朝鲜作为一个国家的封闭性——无论媒体的对外开放还是公民的对外接触，朝鲜都是目前世界上仅存的“封闭”国家之一（如果不是唯一的）。笔者在朝鲜的亲身经历与普通外国人一样，参观、游览、购物、旅行、歇息，无不在“保

安”人员的严密包围和控制之中，给人的感觉是完全置身于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国度。更重要的是，在中国主流媒体关于对外关系的描述中，几十年一贯制，对朝鲜和中朝关系的评价始终保持着一种声音，即使在改革开放最活跃的年代，虽然中国对朝鲜的政策已经有所改变，但在官方媒体上也很少能听到不同的声音。<sup>2</sup>就在不久前的中国，朝鲜问题的敏感程度仍处在这样一种状况，一提到“朝鲜”两个字，人们便噤若寒蝉，左顾右盼，似乎没有人愿意去了解和探索历史的真实。不仅在政治领域和外交领域，就是在学术界，对于朝鲜和中朝关系的评论，也是讳莫如深，学者大多竭力避免踏入这块是非之地。<sup>3</sup>这就难怪中国著名的中朝关系史专家杨昭全老先生在一篇论文中叹道：“遗憾的是，迄今我国尚无一部阐述当代中朝关系史的学术专著。”<sup>4</sup>其结果，造成中国的决策机构及研究人员长期以来对中朝关系的历史缺乏全面的、客观的和真实的了解，他们也和普通百姓一样，完全陷身于那个历史神话之中。

一段时间以来，中国人已经深刻感觉到中朝关系处于一种扑朔迷离的状态，更看到中国对朝鲜的政策似乎也处于一种进退维谷、无从入手的窘境。面对如此困境，关于朝鲜和中朝关系的历史神话却像一个紧箍咒，牢牢地套在人们的头上，外面还裹着一层难以捅破的神秘面纱，令人难以看清出路。而构筑这个神话和面纱的，则是一种特殊的“语境”，即在冷战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为维护由中朝两国老一代领导人共同建立的政治同盟而打造的话语系统。当这种神话、面纱与人们已经接受的中朝“传统友谊”的历史记忆相链接，又被赋予超越现实政治的历史意义时，便成为诠释现实中朝关系时难以突破的特殊“语境”，并使得本来处于变动中的中朝关系难以摆脱历史与现实的两难悖论。这真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其实，在中、朝以外的国度，也存在类似的情况。美国及其他西方的学者为中朝关系的封闭性和神秘性所迷惑，往往是“雾

里看花”，搞不清在处理东北亚问题时，中国是否能对朝鲜产生影响，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什么时候能够产生影响。

中朝关系的现状因袭了沉重的历史包袱，因此，在中国（其实在其他国家也一样），如果想要掌握现实中朝关系的走向，对中朝关系做出准确定位，从而制定一套比较合乎实际的对朝政策，毫无疑问，首先就要了解中朝关系的历史真相，就要知道中朝关系是如何走到今天的。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破除神话，揭开面纱，突破束缚人们头脑的有关中朝关系历史的特殊语境。退一步讲，即使没有任何对国际政治和外交政策的现实关怀，历史学作为一门科学，甚至如马克思所说是唯一的一门科学，<sup>5</sup> 历史研究者，特别是中国的历史研究者，出于学术情怀，也有义务和责任破除中朝关系的历史神话，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本书的目的就是要破解几十年来存在的一个历史神话——中朝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鲜血凝成的、牢不可破的和永恒不变的“友谊”。

然而，对于中朝关系的历史研究却长期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

还在冷战期间，国际学术界对中朝关系历史的研究就是一个薄弱环节。在这方面发表研究成果最多的是韩国学者，且主要是运用政治学的方法分析中朝关系的现状并推断未来的走向。<sup>6</sup> 此期苏联学者的研究成果也有一些，其特点与中国类似，意识形态色彩浓厚，政治性优于学术性，尽管与韩国学者相比，强调了对史料的运用，但分析方法以及结论的科学性和公正性仍值得怀疑。<sup>7</sup> 从历史学角度对中朝关系进行研究的学术成果，在笔者看来，这一时期有两本英文专著值得注意。美国阿拉巴马大学韩裔学者张清教授关注的是中苏分裂后（1958—1975），朝鲜如何利用中苏关系的紧张状态，在北京和莫斯科之间玩弄平衡术，提升朝鲜的独立性，即在外交和意识形态方面倾向中国，同时在军事和经济方面又谋取苏联的援助。<sup>8</sup> 韩国首尔国立大学金学俊教授则比较详细地考察了朝鲜战争期间和

中苏关系破裂以后中朝关系的变化。作者提出并试图解答两个问题：1950年之前中共与朝鲜关系很有限，为何会在关键时刻出兵援助朝鲜；此后朝鲜是如何在中苏两个大国之间周旋而得以发展的。<sup>9</sup>这两部著作都采用了历史学的方法，但共同的缺憾是，限于当时的条件，除了少量美国外交文件，作者所依据的史料都是中国和朝鲜的公开出版物。此外，还有一些学者的论文涉及中朝关系的历史，主要也是基于二手资料的研究。<sup>10</sup>

冷战结束以后，特别是朝核危机发生以来，东北亚问题在国际舞台上日益凸显，关注朝鲜问题以及中朝关系的学者也越来越多。不过，查阅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绝大部分都属于对国际关系的现状分析或政治学研究，真正从历史学角度进行讨论的学者十分有限。<sup>11</sup>涉及中朝关系的历史问题，值得关注的有1996年旅美韩国学者李在锦出版的《中国与朝鲜的变动关系》一书。该书分为战争、军事、外交、经济四章，对1950年代至1990年代中国对朝鲜半岛的政策进行了讨论。作者认为，中国政策的变化，主要是由三个方面的因素决定的：中国国内政治和政策取向，中国对南北朝韩动机和能力的认识，中国与苏联（俄国）、美国和日本的关系。<sup>12</sup>2003年韩国学者李元焯在香港出版了专著《中美两国的朝鲜半岛政策演进历程研究》，重点在中美关系，也从一个侧面讲述了中国对朝鲜半岛政策的演变。作者认为，尽管经历了从宗藩体制向现代关系转变的过程，但由于历史的特殊性（共同抗日及中朝两国共产党“长期密切合作”），中朝关系保持着一种“非常罕见的良性互动”。<sup>13</sup>2009年韩国学者崔明海出版的专著，从国际关系理论的角度，讨论和分析了1961年的中朝同盟条约。作者认为，对中朝关系的解读应摆脱传统的共同应对外部威胁的视角，而强调中朝同盟关系的内部效用；中朝同盟不是一种为了应对共同外部威胁的合作体系，而是为了使对方国家未来不确定性最小化的管理体系。<sup>14</sup>2010年日本学者平岩俊

司出版了论述中朝“唇齿关系”结构与转型的专著，作者分析了从中国人民志愿军撤离朝鲜直到围绕朝核危机的六方会谈中朝关系的结构变化。<sup>15</sup> 这些作者的看法和结论对于人们观察中朝关系的发展过程具有一定的启发作用，不过，书中使用的基本都是公开出版物或间接史料，写作方法也偏重政治学，基本上没有对历史过程的详细描述。

“新冷战史”或“冷战国际史”作为一个新兴历史学科的出现，把国际关系史的研究推上了一个新台阶。这二十多年来，中美关系、中苏关系的研究最为深入，美苏关系、苏联与东欧各国关系、大国在第三世界的争夺等也是学者们研究的重点，其他领域如西欧、日本、印度、东南亚、非洲、拉美，都有研究者感兴趣。关于朝鲜问题，受到国际学界瞩目的首先是朝鲜战争研究，应该说这二十年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sup>16</sup>

进入 21 世纪以后，随着中国、俄国以及原社会主义阵营东欧各国相关档案的陆续解密和披露，人们发现，以往对于朝鲜外交史及中朝关系史的叙事存在很多漏洞、缺陷、舛误以及片面性和虚假性。因而，很多历史学研究者承担起重新构建历史叙事的工作。随着大量档案的披露，有关朝鲜历史以及朝鲜与苏联和东欧国家关系史的研究成果逐渐增多。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北朝鲜政治发展史、<sup>17</sup> 朝鲜劳动党八月事件、<sup>18</sup> 苏联和东欧国家对朝鲜的经济技术援助、<sup>19</sup> 冷战时期苏联与朝鲜关系的变化、<sup>20</sup> 金日成主体思想产生和发展的过程、<sup>21</sup> 北朝鲜统一政策的演变等。<sup>22</sup> 在这些研究中，或多或少都涉及了一些朝鲜与中国关系的历史。比较全面研究朝鲜对外关系历史（1950—1992）的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阿姆斯特朗 2013 年出版的一部专著，该书揭示了冷战时期朝鲜对外关系的动因、过程和效果。书中对中国卷入朝鲜战争、中国对朝鲜经济重建的援助、中苏分裂及中美关系解冻时期朝鲜的对策等都有较多的论述。<sup>23</sup>

专门讨论中朝关系历史的研究成果虽然不多，但也开始出现。

俄国学者 B. A. 希恩在 1998 年出版了《20 世纪后半期的中国与朝鲜》，该书前半部分以六节内容讲述了 1949 年至 1979 年中朝关系的历史，并勾画出中朝关系起伏的大体脉络。书中使用了不少俄国的解密档案，中朝两国的公开文献，以及各种回忆史料。但遗憾的是，全书约一半篇幅讨论的都是 1980 年以后的情况，对于真正可以作为“历史”<sup>24</sup> 的那个时期的研究却显得过于简单，且议论和分析多于史实的描述。总体看，可以说是一部中朝关系简史。<sup>25</sup>

韩国世宗研究所首席研究员李钟奭（曾任韩国统一部部长）于 2000 年出版了《北韩—中国关系（1945—2000）》。该书利用大量新史料讲述了抗日战争后期至 20 世纪末中朝关系的历史，在很多方面还原了中朝两国交往的历史面貌。书中较多使用了口述史料，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中国民间发现了 1962 年中朝边界谈判的相关文件，其中包括中朝边界问题会谈纪要、中朝边界条约正本以及 1964 年 3 月 20 日签订的中朝边界议定书。<sup>26</sup> 可以认为，这是冷战结束至今国际学术界最有价值的一部专门研究中朝关系的历史学著作。不过，该书未能利用后来披露的大量中国、俄国和其他相关国家的档案文献。这也就是书中对朝鲜战争结束前的历史描述较为详尽，而其余部分（除边界问题）则是简单概述的原因。

除了专著，还有一些注重使用最新解密档案的专题论文问世。如德裔美国学者沙弗的两篇论文，运用德国及东欧国家的解密档案，讨论了朝鲜卷入中苏争端的过程，以及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中朝关系变化的历史。<sup>27</sup> 中国学者余伟民以朝鲜劳动党内“延安派”干部的命运为线索，考察了 1950 年代中朝关系的变迁；从苏联对朝政策的角度，论述了中朝关系的形成。<sup>28</sup> 成晓河则主要依靠最新开放的中国外交部档案，讨论了中朝关系在 1960 年代中苏分裂过程中的演变。<sup>29</sup> 美国学者亚当·卡思卡特研究了 1945—1950 年东北延



边地区以朱德海为代表的朝鲜族居民对中共的支持以及他们在朝鲜革命和朝鲜战争中所发挥的特殊作用；1950—1954年中朝之间在社会层面的交往，包括中国是如何接纳和安置朝鲜难民及逃到中国的朝鲜军人，培养朝鲜留学生，接待到中国演出的朝鲜文化团体，以及对朝鲜战后重建的大力帮助等问题。<sup>30</sup>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政治学教授傅瑞珍2015年编辑出版了一本有关中朝关系的论文集，除了关于当下中国对朝政策、朝鲜对外政策及中朝关系的讨论，书中也收入了几篇研究中朝关系历史的文章。<sup>31</sup>

笔者曾广泛利用中国和俄国的双边档案，从中苏关系的角度全面而详细地考察了朝鲜战争的起源、爆发和中国出兵的过程。<sup>32</sup>在这一基础上，笔者发表专文讲述了在战争期间中朝两国领导人之间存在的严重分歧和尖锐矛盾。<sup>33</sup>此外，还讨论了朝鲜战争结束后中国对朝鲜的经济援助、中朝同盟关系建立和延续的过程、中朝边界条约签订的历史背景、中国对朝鲜族边民外逃的政策，以及中美关系和解对中朝关系的影响等问题。<sup>34</sup>

总体来说，国际学界从历史学角度对中朝关系的研究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开头。不过，就研究所涉及的范围以及讨论的深度讲，还很难说是一个比较成熟的领域。在冷战时期中朝关系的历史中，存在一系列尚未解开的谜团，还有很多现象需要解释。本书要回答的根本问题是：毛泽东时代的中朝关系是否具有一种特殊性？这种特殊关系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什么时候结束的？其基本的和本质的特征是什么？以下诸多细节都是这一根本问题的反映：

——早期朝鲜共产党人与中共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大批本来属于朝鲜共产党的成员为什么、又是如何加入中国共产党的？

——在国共内战期间，特别是东北内战时期，朝鲜革命者曾给予中共很多援助，但是为什么中共中央与朝鲜劳动党并没有什么直接联系，很多中共领导干部甚至当时还不知道金日成是何许人也？

——早在 1949 年夏天斯大林就决定把领导亚洲革命的责任交给中共，毛泽东对此也欣然接受，但是为什么在中共中央为亚洲各国共产党举办的“学习组”或马列学院中，唯独没有朝鲜党的干部？

——战争爆发后，毛泽东始终积极主张出兵朝鲜，甚至在美军越过三八线、苏联拒绝出动空军等极为不利的条件下，力排众议，毅然决定派兵入朝，其初衷除了对中苏同盟的考虑，还有没有想到朝鲜问题？

——朝鲜战争使中国付出了沉重的人员伤亡和物质损失，战后金日成上门求援时，为什么中国提供的资金和物质援助在数量上却大大超过了在战争中处于二线的苏联和东欧国家对朝援助的总额？

——金日成 1955 年底提出批判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要全党确立“主体”，其背景和核心内容是什么，针对的目标是苏联还是中国，或者两者都在其中？

——1956 年朝鲜劳动党发生内乱，金日成索要逃亡中国的延安派干部，毛泽东大发雷霆，一反常态地对朝鲜内政进行干涉，原因何在？

——1958 年中国全部撤回驻朝志愿军部队的动议是如何提出的，难道其目的就是像当时人们理解的那样，为了政治宣传和逼迫驻韩美军撤退？

——早在朝鲜战争爆发前，金日成就提出要与中国结盟，但为什么中朝同盟条约在战争结束八年后才迟迟签订，而且是与苏朝同盟条约同时签订？

——稍微了解一些当代史的中国人几乎都知道 1962 年新疆边民大规模外逃的“伊塔事件”，但有多少人听说过与此同时在东北地区发生的人数更多、时间更长的朝鲜族居民非法越境向北朝鲜移民的事件？

——1962 年中朝边界条约谈判和签署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为什

么中朝之间争执了上百年的长白山和天池归属问题在短短几个月内就解决了？

——毛泽东三番五次对金日成讲，中国东北就是朝鲜的大后方，将来就交给朝鲜来打理，其用意究竟是什么，金日成对此作何反应？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国处于外交政策失控、对外关系孤立的情况下，期间中朝关系恶化的主要原因何在，两国领导人是怎样考虑的？

——在中美关系缓和的秘密谈判中，朝鲜问题处于何种地位，周恩来是如何解除金日成的顾虑，又是怎样满足朝鲜的要求的？

——自1960年代初至本书叙述的时期为止（“文革”前期短暂的低潮除外），中国为了维持与朝鲜的友谊，对金日成一直是有求必应、百依百顺，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

——在毛泽东晚年，朝鲜在全世界大力宣扬、推崇主体思想和金日成主义，并提出世界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其原因及目标何在？

——中朝同盟关系的基础是由哪些因素构成的，这一基础何时发生了变化，又是如何开始解构的？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从以上对中朝关系研究状况的介绍以及这些值得思考和解答的问题可以看出，要了解中朝关系的历史真相，还有大量的工作等待着历史学家。而中国研究者首先需要进行的一项工作，就是抛开困扰人们的现实语境，从原始档案入手，解构人们心目中已经存在的中朝关系的历史神话，在严肃、扎实和经过考证的史料基础上，重新建构有关中朝关系基本史实的历史叙事。这正是本书的主旨。

这里，首要的问题是史料的发掘。

目前，涉及中朝关系的当事国档案及相关各国档案的解密和开放程度，虽然不尽如人意，但仔细考察，作为研究的基础，其内容和数量还是相当可观的。

首先当然是中国档案。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自 2004 年开放以来，已经分三批解密了大量档案文件，期限到 1965 年底。其中，涉及朝鲜的卷宗共 2424 个，内容包括中朝两国领导人的谈话记录、外交部与驻朝使馆间的往来电报、外交部及相关机构有关朝鲜问题的情报资料汇编、处理中朝关系问题的一些规定和办法，以及驻朝使馆编写的工作报告和大事记等等。这些原始文件，对于研究中朝关系的历史非常重要，也是本书的基本史料之一。不过，目前中国外交部档案的开放有两个缺陷。其一，解密速度太慢，目前只到 1965 年，此后的档案（按照中国档案法规定至少可到 1981 年）何时解密，尚不得而知。其二，解密限制过多，凡是涉及中朝之间分歧、矛盾和冲突的档案，原则上均不予解密，而人们可以看到的档案，反映的都是中朝友好和亲密往来的内容。因此，如果单纯依靠中国的外交档案，研究者不仅会受到考察年限的制约，而且很可能会得出片面的结论。

中国各省市档案馆的开放，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外交档案开放的缺陷。中国地方档案的解密期一般都已到 1980 年代，有的甚至到 1990 年代。其内容主要包括：1.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有关朝鲜问题的政策规定，全局性的都会印发各省市，局部性的也会发到相关省市；2. 凡参与对朝鲜进行经济技术援助或朝鲜访华代表团去过的各省市，均存有大量相关的报告、通报、总结等文件；3. 有些涉及朝鲜的具体或特殊问题的省市，还存有不少与中央有关部门的往来函电，如四川省、陕西省和山西省档案馆收藏的有关流亡中国的朝鲜劳动党延安派干部生活状况的文件。本书对许多史实的考证和描述，便得益于来自上海市、湖北省、吉林省、河北省、四川省、山西省以及一些县市的地方档案。<sup>35</sup>

自 1980 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官方研究机构，如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等部门，陆续编辑、出版了数量相当可观的档案文献集和中国领导人的年谱、文

集、文稿、传记。尽管这些文献在选择和编辑的过程中受到严格限制甚至改动，不如研究者亲自到档案馆查阅那样有自主性，但是对于了解中国的对外政策和对外关系，仍然是不可或缺的直接史料。

在查阅中国资料方面，还有一个情况特别值得注意。中共中央及政府各部门都办了一些内部刊物，如中宣部编的《宣教动态》《宣传通讯》，中联部编的《各国共产党动向》《各国共产党简况》《兄弟党和兄弟国家报刊材料》，国务院外事办公室编的《外事工作通讯》，外交部编的《外事动态》，公安部编的《公安工作简报》，新华社编的《内部参考》《国际共运参考资料》，等等。这些内刊非常全面地报道了各方面、各领域的问题和情况，虽然较少反映决策过程及结果的情况，但是从中可以了解到中国领导人及决策机构据以作出决策的大量信息和情报，也可以看出高层的意向和倾向。因为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非常重视这些内刊，不但案头必备，还经常推荐一些材料予以刊登。这一点，只要翻阅一下《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毛泽东文集》便可知。36 这些刊物在地方档案馆和很多图书馆都有收藏，不难找到。

朝鲜的档案自然是封闭的，无人得见。研究者可以利用的，只有目前已经公开出版的资料，如朝鲜领导人的讲话和著作，朝鲜劳动党的历次会议文件，以及朝鲜劳动党机关报《劳动新闻》、理论刊物《勤劳者》及其他出版物。然而，这些材料的真实性和可靠度十分有限，研究者在使用时必须谨慎小心，否则必定落入“陷阱”。例如笔者发现，朝鲜出版的《金日成著作集》，中文版和韩文版就有差别，一些有关中国问题的讲话和报告在中文版里是没有的。还需注意的是，对很多报告和讲话，出版者在编辑文集时做了大量修改。37 此外，正如长期研究朝鲜问题的兰科夫教授指出的，阅读朝鲜的报刊资料，需要对朝鲜政治和党的术语有深入的了解，并掌握其中的奥秘。38 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对于朝鲜的外交内政及其决策情况

的了解，只能通过与其交往的各个国家的档案资料。

事实上，在俄国、匈牙利、民主德国、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蒙古等与朝鲜交往密切的原社会主义国家的解密档案中，涉及朝鲜和中朝关系的内容非常丰富。最近几年来，这些国家档案的解密，不仅使研究者得以看到许多朝鲜政策的制定过程及变化情况，而且可以填补中国外交档案在中朝关系问题上“报喜不报忧”的缺憾。例如，关于1956年八月事件前后中朝关系几近分裂状态的情况，如果没有大量俄国的解密档案，人们是很难了解其内幕的。对于“文化大革命”期间朝鲜对中国的看法和态度，以及中朝关系的变化过程，则只能依靠东欧各国及蒙古档案提供的众多信息才能得以把握。因为关于这一时期中朝关系的俄国档案和中国档案均未解密。至于如何克服阅读东欧各国档案在语言方面的障碍，美国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的冷战国际史项目（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和北朝鲜国际文献项目（North Korea International Documentation Project）做出了卓越贡献，他们不仅组织专家对大量东欧各国档案进行挑选，而且还把其中相当一部分重要文件翻译成英文，以便各国学者利用。<sup>39</sup>

在冷战时期，中朝关系无疑属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因此，利用原社会主义国家各国档案对其进行观察和分析，自然是研究者必须要做的功课。但是，来自铁幕另一边国家的档案文献也并非不重要，在某些问题上，甚至是必不可少的。这就涉及韩国档案和美国档案的利用。韩国外交史料馆的开放，为研究者提供了观察中国和朝鲜外交政策以及中朝关系的完全不同的视角和史料来源。特别是从1960年代后半期开始，这里不仅保存着大量关于朝鲜外交关系的卷宗，而且每年都有专门的朝鲜与中共关系的卷宗。此外，朝韩关系也是影响中朝关系的重要因素，而韩国外交档案有关朝韩双方接触、交涉、谈判等情况的记录，就成为目前了解这一背景独

一无二的原始档案。美国档案的解密和开放，在世界上大概是最规范、最及时的。对于中朝关系，美国档案馆当然没有直接的文献证据，但是中央情报局、国务院情报研究所以及驻韩美军情报部门的情报评估和分析报告，却是不可不读的珍贵史料。尽管除少量秘密情报外这些报告基本上是依据报刊杂志或其他公开的信息成就的，但其观察之细微，分析之精到，不仅可以启发思路，也为研究者提供了大量间接史料。<sup>40</sup> 还有，在1970年代初中美关系和解的过程中，中国在处理朝鲜问题上的考虑及其做法，无疑对中朝关系有重大影响，而在这方面，目前主要依靠的只能是美国最新解密外交文件尼克松卷宗及其他外交档案。<sup>41</sup>

在此值得提及，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正在实施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及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其任务之一就是整理、翻译涉及冷战时期中朝关系的国外档案（主要是俄国、美国、韩国及东欧各国）。目前，工作进展顺利，收集和整理阶段已经结束，正在进行翻译。

口述史料的利用对于历史研究也十分重要，特别是在档案文献短缺的情况下。对于像朝鲜这样一个“神秘国家”，单凭公开信息和文字资料是很难了解的。由于背景复杂和文化差异，有时甚至很难进入文献的语境。在这种情况下，对当事人的采访及其回忆录的利用就是不可缺少的。韩国学者对于北朝鲜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广泛利用当事人和“脱北者”（defector，即从北朝鲜逃离者）的口述回忆及采访资料，对中朝关系的研究也是如此。前述李钟奭的专著，就大量使用了对当事人采访的记录。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1991年采访了曾经担任朝鲜内务相和职业总同盟（即总工会）委员长的徐辉和原朝鲜劳动党平壤市副委员长洪淳宽。重要的是此二人在1956年八月事件后逃亡中国，此后一直在中国生活。在很大程度上，他们的曲折经历就是一部中朝关系的晴雨表。

了解到 1956 年曾有大批朝鲜干部逃亡中国的情况后，笔者也曾四处打听，多方探寻。可惜的是，当笔者 1995 年通过陕西省老干部局在西安找到洪淳宽时，老人已重病在身，无法说话。而住在他楼上的徐辉，两年前便已经病逝。毕竟是功夫不负苦心人，笔者 2010 年终于在太原市找到了原朝鲜内阁文化省副相金刚和劳动党平壤市委组织部长金忠植，他们虽年事已高，还是接受了笔者的长时间采访，详细回答了所提问题。<sup>42</sup> 对他们口述回忆的记录，也是本书重要的史料来源。

上述中国、俄国、美国、韩国和东欧各国相关的档案文献以及中朝两国的公开出版物，再加上部分口述史料和前人的研究成果，构成了本书主体叙事的史料基础。

本书的主要任务就是对这些经历千辛万苦收集到的大量史料进行鉴别和考证，并在此基础上，梳理出从中朝两国共产党建立直到中国走上改革开放道路这一历史阶段（主体是冷战时期），中朝两党及两国关系发展的大体脉络。

笔者在研究中注意到，影响中朝关系的因素主要有四个方面：

1. 地缘政治：长期以来，朝鲜一直是中国东北地区安全的门户，从甲午战争到朝鲜战争，朝鲜的动荡往往牵动中国的神经；在中苏关系恶化时，朝鲜站在哪一边对于中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2. 冷战格局：在两大阵营对峙的世界格局中，朝鲜是社会主义阵营的东方堡垒，在中美对抗时期，朝鲜则成为中国的盟友和前哨阵地，因而备受中国关注。
3. 意识形态：朝鲜和中国都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双方共同信奉的指导思想，国际主义原则和党际关系构筑了双边关系的政治基础。从这个角度看，中朝关系反映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政治结构的普遍性。
4. 传统理念：朝鲜历史上曾长期作为中国的藩属国和保护对象，置于中国封建王朝的管制之下，传统的“天朝”理念在一定程度上保留在当时中国领导人（特



别是毛泽东)的观念中,而金日成在追随中国的同时则始终以反对“事大主义”、维护朝鲜独立自主为己任。从这个角度看,中朝关系又有其明显的特殊性。笔者在叙述和分析中朝关系的历史演变时,基本上是围绕这几个方面展开的。

全书的写作结构和基本逻辑是:中朝两国共产党人都是在莫斯科的培育和扶植下发展起来的,而他们之间却没有建立起直接的关系,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并制约了后来中朝两国关系的走向;二战结束以后,朝鲜成为苏联的卫星国,而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出兵援朝以及斯大林去世,使得中国逐步取得了在朝鲜问题上的话语权和主导权;中苏共同干预朝鲜劳动党内部事务失效后,毛泽东转而采取安抚政策,帮助金日成确立了其在党内的绝对统治地位,北朝鲜也由此真正取得独立地位;中苏关系恶化并最终导致同盟破裂,为朝鲜提供了广阔的政治和外交空间,金日成左右逢源,极大地提升了朝鲜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毛泽东采取的联美抗苏战略虽然尽力关照朝鲜的利益,但也因不得不放弃意识形态制高点,而把中朝两国的外交路线推向对立,中朝关系已是貌合神离;金日成有意扛起世界革命的大旗,继承毛泽东的继续革命,而中国则全面改革开放,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开始了新的里程,中朝两国关系表面平和,实际上已经分道扬镳。冷战结束后,随着中国与韩国正式建交,中朝关系在客观上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

在梳理和解读史料的过程中,笔者注意到中朝关系演变过程中的一些重要的历史现象:

一、从战后斯大林对苏联在亚洲战略利益的设计看,北朝鲜是莫斯科必须实行有效控制的地区之一。朝鲜战争结束后,毛泽东为了拉住朝鲜,继续进行扶植,使其长大成材。实际上,正如毛泽东所言,朝鲜这棵“小树”是苏联和中国共同栽培的。

二、中国出兵朝鲜的必然结果之一,就是取得了社会主义阵营

内部对朝鲜问题的话语权和主动权，而在斯大林去世和朝鲜战争结束后，朝鲜逐渐改变了其苏联卫星国的地位和形象。但与此同时，朝鲜争取独立地位斗争的矛头也开始转向中国。

三、在中国东北居住的大量朝鲜移民及其后代属跨界民族，他们与邻居的朝鲜人有着共同的语言、文化、生活习惯和历史传统，而对中华民族却长期缺乏认同感。这种情况一直困扰着中朝关系，并直接影响了边民流动、边界划分乃至中国边疆地区的稳定。

四、在中苏关系恶化和长期紧张对立的过程中，朝鲜左右逢源，两边获利。在中朝交往的绝大多数情况下，朝鲜都可以保持主动地位，而在发生分歧、冲突和危机的时候，基本都是中国首先表现出和解姿态，并做出让步。

五、中朝关系几十年的发展并非如双方宣传的那样表现为“永恒的友谊”，而是冷暖无常，变幻莫测。同其他社会主义内部的国家关系一样，中朝同盟始终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尽管在表面看来平静如水。

六、毛泽东时代的中朝关系确如邓小平所言“是一种特殊的关系”。<sup>43</sup> 这种特殊性的本质在于，中国尽可能地满足朝鲜的一切要求，特别是给予朝鲜充分的自由和主权，而朝鲜则离不开中国提供保护和帮助。1957年毛泽东最终确定的中国对朝鲜方针，就是这种特殊关系的基础。此后直到毛泽东去世，尽管双方关系仍不免存在矛盾，但毛泽东和金日成都在尽力维护两国的同盟关系和兄弟关系。中美关系缓和造成中朝外交战略的分歧，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则彻底结束了中朝之间的特殊关系。

对于上述现象的解释，笔者在结语中提出，问题的实质在于：中国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本人）处理中朝关系时的出发点，从表面看是世界革命理念，但其内核则是中国传统的中央王朝观念，把包括朝鲜在内的周边国家（尤其是东亚）都视为同一阵营或可能联盟中

的被领导者，试图打造一个革命的“天朝”，而金日成一生的奋斗目标就是谋求朝鲜的独立地位和个人（及家族）的专制统治。因此，就外交理念而言，中朝之间的矛盾是潜在的，且时时发酵。在处理冷战格局下的现实问题中，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出发，为了应对美国的围堵以及后来苏联的威胁，中国需要朝鲜成为自己在东北亚的“挡箭牌”和战略缓冲地带，而朝鲜需要中国成为自己的“大后方”，他们确实结成了一种特殊的同盟关系。但是，朝鲜与中国的关系始终处于若即若离的状态，特别是到中美关系缓和以后，中朝同盟关系在外交战略层面实际上已出现裂痕。所以，毛泽东理想中的“天朝”最终还是在他去世后走向了终结。在更深的层次上，中朝国家关系的症结与历史上的中苏关系一样，就在于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国家关系的结构性弊病——这种关系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党际关系原则为基础，因此这种特殊关系不是现代国家的正常关系。

历史研究首要的和主要的功能就是还原历史，把历史过程讲述清楚，尤其对于那些世人尚不了解或未搞明白的历史过程——现代中朝关系史当然属于这一范畴。这就需要历史研究者掌握尽量多的史料，并对所有收集到史料进行分析、考证，由表及里，去伪存真，找到它们之间的逻辑链条，如此才可能呈现出一幅比较真实、完整、清晰的历史画面。也只有在此基础上，历史学研究者，以及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国际关系学研究者，才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理论上的概括和归纳，才可以从不同的解释框架出发进行对话和讨论。但愿笔者的努力能够为人们了解中朝关系历史、研究当代中朝关系和朝鲜问题提供一个比较实在的基础。——这就是本书的宗旨。